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2.01.017

集团化办学各环节办学成效与整体办学成效的关系研究

师悦¹, 王俊²

(1.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93; 2. 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 基于D市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调查数据, 采用回归分析和夏普利值分解探索集团化办学各环节成效与整体成效的关系, 结果发现政策保障、学生素养和文化融合三个环节的办学成效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大, 组织领导、教师发展两个环节的办学成效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小, 课程建设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均值结果显示, 整体而言, 文化融合均值最高, 学生素养均值最低。结合均值得分、回归分析以及夏普利值分解结果发现, 政策保障和学生素养是对整体办学成效具有较大影响但均值得分较低的环节。基于上述发现讨论提高集团化办学质量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集团化办学; 办学成效; 回归分析; 夏普利值分解

中图分类号: G63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84(2022)01-0099-08

1 问题提出

集团化办学是当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1978年基础教育恢复重点学校的政策, 为特殊时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急需人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 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 由于历史及其他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差距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择校问题一直存在。因此, 为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集团化办学成为一种重要的路径选择。

D市自从2007年启动集团化办学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已形成集团化办学核心校106所、成员校315所, 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达到66.86%。集团化办学迅猛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例如集团化办学成效评估体系不完善、重点环节把握不清等问题。与此同时, 学术界对于集团化办学的研究多侧重于概念性分析, 且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缺乏实

证性的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成效评估作为有效的政策评判依据^[1]。在此背景下, 系统梳理D市集团化办学的十年经验, 通过实证研究和量化评估, 优化集团化办学成效评价体系, 探寻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影响最大但又亟须改进的环节因素, 对提高集团化办学效率、把握重点、精准发力具有重要意义。最后, 希望本研究能够为D市乃至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成效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评估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分析框架

考虑到集团化办学是众多办学环节的集合体, 每一环节的成效都会影响集团化办学的最终效果, 本研究将集团化办学成效划分为各环节办学成效和整体办学成效两个方面。两者的结合有利于更好地了解集团化办学成效, 探索两者关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不同集团化办学环节的相对重要程度, 进而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集团化办学

收稿日期: 2021-07-17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重点资助课题(B-a/2020/02/02)

作者简介: 师悦(1992—), 女, 山东临沂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

的改进重点,提高集团化办学成效与效率。因此,本研究基于美国管理学家斯蒂芬·科维(Stephen R. Covey)四象限法则^[2],结合已有研究分析框架^[3],根据集团化办学各环节成效的均值得分及其对整体办学成效的预测作用大小,将各环节变量区分为如下四类:均值高、影响大;均值高、影响小;均值低、影响小;均值低、影响大(见图1)。显然,均值得分较低且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影响较大的环节应当是集团化办学中最值得优先改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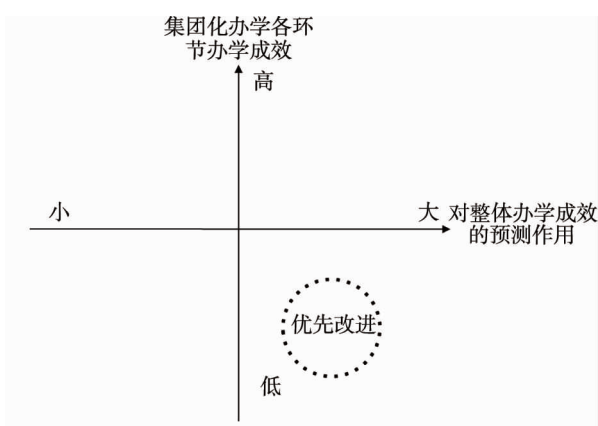


图1 集团化办学各环节分组框架

2.2 调查工具

借鉴已有研究、已有指标体系以及上海、江苏等地教育行政部门官方公布的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指南和评估标准,辅之以专家、集团校长、政府主管人员、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员以及教师的座谈研讨,最终构建了《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实施现状与成效调查问卷》。具体内容包括背景变量、六个办学环节的成效评估(课程建设、学生素养、教师发展、组织领导、文化融合、政策保

障)以及整体办学成效评估。其中,课程建设主要包括课程共建、课程共享的效果等;学生素养主要包括学生的生源质量、学习氛围、学业质量、学生对学校的喜爱程度;教师发展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能力、集团内交流的意愿等;组织领导主要包括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各项制度、管理的效果等;文化融合包括能够认同集团的办学理念、能够保持自己的发展特色等;政策保障包括教育主管部门为集团化办学提供的专项经费、教师编制等。考虑到集团化办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办学的优质均衡,因此整体办学成效主要采用集团化办学后集团内各校的优质均衡水平等进行测量。

2.3 数据来源

集团化办学的目的在于依靠核心校带动成员校的加速发展,进而缓解“择校热”问题,因此,成员校的办学成效更加需要关注。就评价主体的选择而言,已有研究多采用多主体综合性评价的方式,将多个主体的评价有效结合起来,力求完整、有效地对集团学校的办学效益进行科学评价。整体而言,评价主体主要集中于学生、家长、教师以及学校行政人员。但通过访谈,发现学生与家长对于集团化办学并不了解,无法实现对集团化办学的有效评价。相比而言,教师与学校行政人员对集团化办学各个环节都较为了解。综合以上两点,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D市集团化办学成员校的行政人员和教师,课题组于2019年5月向集团化办学成员、校行政人员和教师分别推送电子问卷,最终共回收1607份,其中,学校行政问卷294份、教师问卷1313份。样本基本背景信息见表1。

表1 研究样本的基本背景信息

背景变量		学校行政		教师	
		人数	%	人数	%
性别	男	109	37.1	208	15.8
	女	185	62.9	1105	84.2
所在学校(校区)集团化办学类型	一体化办学	88	29.9	424	32.3
	委托管理	27	9.2	170	12.9
	合作办学	25	8.5	178	13.6
	联盟式办学	154	52.4	541	41.2
所在学校(校区)是否与集团核心校在同一行政区域	是	250	85.0	1040	79.2
	否	44	15.0	273	20.8
所在学校(校区)性质	公办	276	93.9	1151	87.7
	民办	18	6.1	162	12.3
所在学校(校区)地域	城市	181	61.6	816	62.1
	非城市	113	38.4	497	37.9

2.4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和夏普利值分解。具体而言,用描述性统计考察研究样本的背景信息和集团化办学各具体环节实施成效的均值状况,用回归分析考察集团化办学各具体环节实施成效对整体办学成效的预测作用大小,用夏普利值分解计算各具体环节实施成效对于整体办学成效的贡献率,并将回归分析结果与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统计

表2呈现了集团化办学各具体环节及整体办学成效的均值情况。统计结果显示,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对于集团化办学各具体环节及整体办学成效评价都较高。具体而言,从全样本来看,文化融合得分最高,均值为4.29分,学生素养得分最低,均值为4.07分。从学校行政人员来看,文化融合得分最高,均值为4.36分;学生素养和政策保障得分最低,均值为4.10分。从教师来看,文化融合得分最高,均值为4.28分;学生素养得分最低,均值为4.06。整体而言,学校行政人员对于集团化办学的评价高于教师。

表2 集团化办学成效的均值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学校行政人员	教师
课程建设	4.20	4.23	4.19
学生素养	4.07	4.10	4.06
教师发展	4.20	4.25	4.19
组织领导	4.24	4.28	4.22
文化融合	4.29	4.36	4.28
政策保障	4.12	4.10	4.13
整体办学成效	4.14	4.18	4.14

3.2 回归分析

使用回归分析考察集团化办学各具体环节办学成效对整体办学成效的预测作用。将整体办学成效作为被预测变量,各具体环节办学成效作为预测变量,并将集团化办学类型、所在学校(校区)是否与核心校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所在学校(校区)性质、所在学校(校区)地域等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回归分析方法为强迫进入法,分别对全样本、学校行政人员样本以及教师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三次回归分析的Durbin—Watson值都处于优质区域内,且接近2这个完美

值。对残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残差分布较好地满足进行OLS回归的正态性要求,说明样本数据均适合进行OLS回归。同时,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三次回归分析均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回归分析的最终数据结果见表3。根据 R^2 结果,纳入的自变量对整体办学成效变量有较高的方差解释率。在标准化回归系数上,从全样本来看,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影响最大的环节是政策保障($\beta = 0.324, p < 0.001$),其次是学生素养($\beta = 0.245, p < 0.001$)、文化融合($\beta = 0.242, p < 0.001$)和组织领导($\beta = 0.165, p < 0.001$),而课程建设和教师发展对整体办学成效都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从学校行政人员模型来看,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影响最大的变量为文化融合($\beta = 0.295, p < 0.001$),其次是学生素养($\beta = 0.201, p < 0.001$)、教师发展($\beta = 0.200, p < 0.01$),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对整体办学成效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不过预测效应较小,而课程建设对整体办学成效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从教师模型来看,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影响最大的变量为政策保障($\beta = 0.418, p < 0.001$),其次是学生素养($\beta = 0.242, p < 0.001$)、文化融合($\beta = 0.207, p < 0.001$)以及组织领导($\beta = 0.156, p < 0.001$),而课程建设和教师发展对整体办学成效都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可以看出,学生素养和文化融合是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共同认可的关键环节,未来评估中两者应当在集团化办学成效测量指标体系中占有更大权重。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教师发展、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的预测作用上:就教师发展而言,学校行政人员认为教师发展环节对整体办学成效有显著正向预测,教师则认为教师发展环节对整体办学成效没有显著正向预测,甚至产生负向影响;就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而言,相比于学校行政人员,教师认为其对整体办学成效有更强的预测力。

3.3 夏普利值分解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集团化办学各环节办学成效对整体办学成效的贡献度,或者说相对影响,使用夏普利值分解这一方法来计算各个环节办学成效对整体办学成效的贡献率(见表4)。就全样本而言,对整体办学成效影响最大的环节有政策保障(31.47%)、学生素养(23.24%)、文化融合(22.95%)。就学校行政人员样本而言,对整体办

学成效贡献率较大的环节有文化融合(27.47%)、学生素养(19.12%)、教师发展(19.07%)。就教师样本而言,对整体办学成效贡献率较大的环节

有政策保障(40.90%)、学生素养(22.77%)、文化融合(19.5%)。夏普利值分解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3 对整体办学成效的多元回归分析(OLS回归)

变量	模型—全样本	模型—学校行政人员	模型—教师
委托管理(一体化办学)	-0.006	-0.010	-0.002
合作办学(一体化办学)	-0.004	0.006	-0.004
联盟式办学(一体化办学)	-0.018	-0.044	-0.014
是否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是)	-0.022*	-0.009	-0.026**
学校/校区性质(公办)	0.023*	0.037	0.022*
学校/校区地域(城市)	-0.009	-0.013	-0.006
课程建设	-0.009	0.047	-0.019
学生素养	0.245***	0.201***	0.242***
教师发展	0.034	0.200**	-0.001
组织领导	0.165***	0.145*	0.156***
文化融合	0.242***	0.295***	0.207***
政策保障	0.324***	0.088*	0.418***
F	1 245.989***	155.136***	1 193.603***
N	1 607	294	1 313
调整后的 R ²	0.903	0.866	0.916
Durbin—Watson	1.985	2.118	1.970

注: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号里为虚拟变量参照组。

表4 夏普利值分解结果

研究变量	全样本	学校行政人员	教师
委托管理(一体化办学)	0.04%	-0.05%	0.02%
合作办学(一体化办学)	0.04%	0.04%	0.05%
联盟式办学(一体化办学)	0.62%	2.36%	0.42%
是否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是)	0.21%	-0.06%	0.34%
学校/校区性质(公办)	0.59%	0.92%	0.56%
学校/校区地域(城市)	0.23%	0.29%	0.16%
课程建设	-0.50%	4.13%	-0.93%
学生素养	23.24%	19.12%	22.77%
教师发展	3.11%	19.07%	-0.08%
组织领导	15.63%	13.72%	14.57%
文化融合	22.95%	27.47%	19.5%
政策保障	31.47%	7.88%	40.90%
残差	2.37%	5.09%	1.74%
总体	100.00%	100.00%	100.00%

3.4 办学成效的分组考察

根据图1分析框架对集团化办学各环节办学成效进行分组考察。经分析,全样本、学校行政人员以及教师样本在分组结果上基本一致,因此这里以全样本数据进行结果展示。首先,将各环节办学成效以平均值为界(4.19)分为均值高低两

组:文化融合(4.29)、组织领导(4.24)、教师发展(4.20)、课程建设(4.20)归为高分组,学生素养(4.07)、政策保障(4.12)归为低分组。其次,以各环节办学成效对整体办学成效的贡献率均值(15.98%)为界将各具体环节分为大小两类,其中,政策保障(31.47%)、学生素养(23.24%)、文化融合

(22.95%)归为贡献率较大组,课程建设(-0.50%)、教师发展(3.11%)、组织领导(15.63%)归为贡献率

较小组。最终得到如图2所示的集团化办学各环节变量分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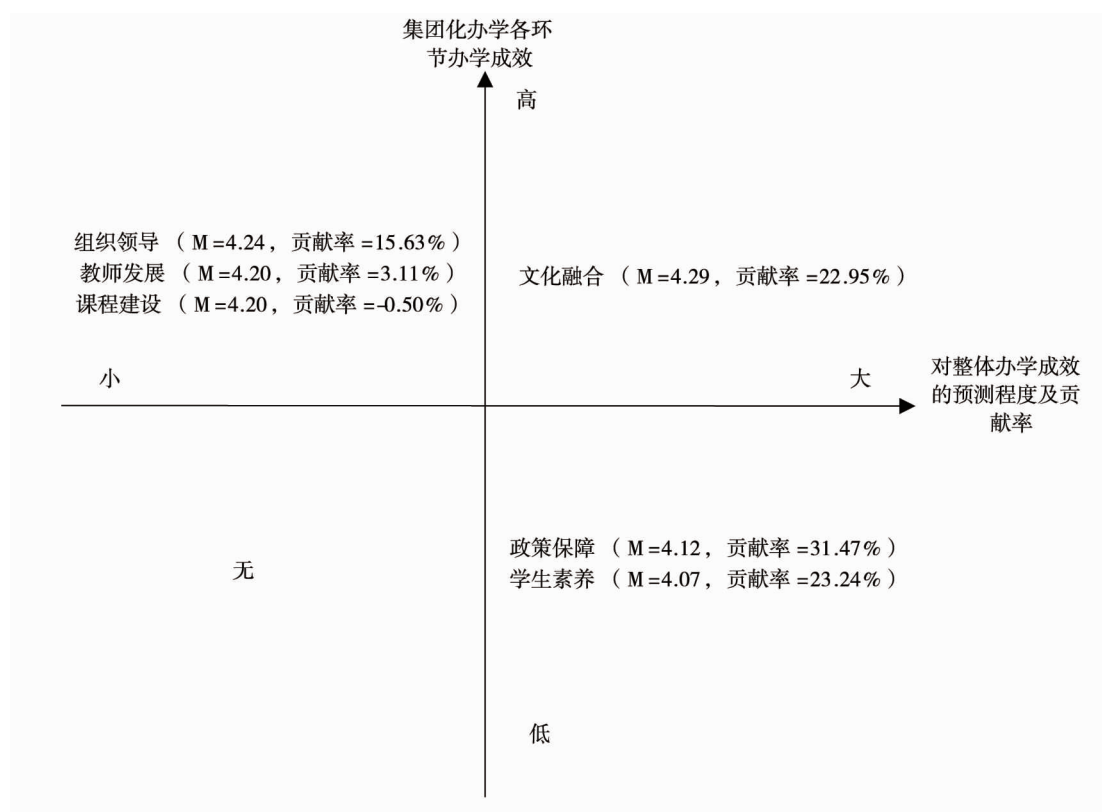


图2 集团化办学各环节具体环节分组结果

可以看出,政策保障和学生素养是均值得分较低但对整体办学成效影响较大的环节变量,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应对此引起充分重视。文化融合虽然对整体办学成效影响较大,但均值得分较高,因而相对来说可以提升改进的空间较为有限。组织领导、教师发展和课程建设均值得分也比较高,不过对整体办学成效影响较小,其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探索与明确。通过对相关题项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组织领导、教师发展和课程建设三个环节,特别是教师发展和课程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共性,即各项活动开展如火如荼但实际成效却不容乐观,说明各环节开展停留于形式,实质性的成效并不大,亟待引起重视。另外,所呈现的所有环节中,未发现均值低且对集团化办学成效影响较小的环节变量。

4 主要发现、讨论与建议

4.1 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对集团化办学各环节办学成效与整体

办学成效关系展开探索,主要研究发现总结如下:第一,文化融合均值最高,学生素养均值最低;第二,不管是全样本、学校行政样本还是教师样本均显示,学生素养、文化融合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具有较大的正向预测作用;第三,在学校行政和教师的认识差异上,主要表现在教师发展、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的预测作用上;第四,整体来看,学生素养、政策保障是均值得分较低且对整体办学成效影响较大的因素。

4.2 讨论与建议

4.2.1 构建综合评估体系,明确集团化办学投入重点

科学的评估体系可以有效地诊断集团化办学的效果、效益和效率,减少试错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集团化办学优化改进的重要依据。虽然集团化办学开展已久,但目前仍没有形成对集团化办学成效评估的权威考核标准,没有形成独立完善的成效评估指标体系^[1]。从实践层面看,当前对集团运行质量的监督和评估主要局限于集

团或各校自身的总结与会议讨论,仅有少数省市出台了集团化办学成效的评估体系,且多数评估体系缺乏整体视域,不能全方位地把握集团化办学的现状和成效。从理论研究来看,基于上述问题,也有学者开始关注集团化办学成效评估体系的构建,但目前来看与此话题高度相关的研究凤毛麟角,并且在质量上有待提高^[4]。总之,不管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对集团化办学成效的评估尚处于碎片化阶段,评估体系有待进一步构建与完善。整体而言,评估指标体系的确立需要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指标体系的内容构成,二是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本研究在已有研究、指标体系、评估标准等基础上,结合D市集团化办学的实际情况,辅之以座谈研讨,确立了指标体系的内容,构建了D市集团化办学成效评估的综合评价体系,在整体指标体系的设置上全面反映了D市集团化办学的各关键环节。随后通过实证调查,借助区域视域下集团办学成效评估数据,对各测量指标的贡献率进行了明晰,明确了未来D市集团化办学的投入重点。最终的目的在于能够为D市乃至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成效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评估思路与框架。希望通过“全面检验+重点推进”两步走的方式,精准服务于集团化建设发展。未来相关部门应积极构建多维度的集团化办学评估机制,通过督导评价把脉会诊,关注集团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抓主要矛盾。将集团化办学的堵点、痛点和薄弱点看全、找准,针对发展的短板进行突破,针对一些卡脖子问题进行创新,以保证教育集团建设场域内的要素组合发挥最大效能^[5],提升集团化办学的综合办学效益。但同时应注意督导模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督导评价实施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教育集团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设计过程,随着集团化办学的推进和外界条件的变化,集团化办学可能会遇到新的挑战 and 机遇。因此,评估体系也应依据集团化办学发展规划目标和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督导评价的实施也应形成一个科学周期,例如通过年度滚动调查等方式,真正促进教育集团的发展。

4.2.2 集团各校共谋发展,聚力提升学生素养

学生素养的提升是集团化办学的核心诉求和终极目标。前文结果表明学生素养是学校行政人

员和教师共同认可的重要环节变量。整体而言,通过集团化办学,学生素养得到提升,但相比于其他环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是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均值得分最低但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影响较大的因素,因而应是D市集团化办学的改进重点,其相应指标也应在D市集团化办学成效测量指标体系中占有更大权重。学生素养成效评估得分最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学生素养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注入与付出;另一方面可能在于集团化办学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学生素养提升的因素。例如,集团内校际活动推进不力的问题。集团化办学背景下,教师的流动意愿不高^[6],且校际的学生素养培育活动只是节点开展,不能形成以主题和项目为抓手的系列活动,对学生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短期的。再如,集团内成员校投入程度和研发水平不一的问题。在目前部分集团办学过程中,存在几种不利于成员校学生素养提升的现象:一是集团个别成员校因为行政的要求,迫不得已成为集团的一员,面上也能够参与集团组织开展的学生活动研讨,但是研讨过后还是以本校为主,没有基于本校学生实际进行有效的消化吸收和提炼,使参与集团化办学呈现出“虚有其表、徒具新型”的应付性行为,对核心校的认同度不高,投入程度也比较浅,发展状态没有明显改善;二是相对薄弱的学校,特别希望核心校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扶,各项集团层面的研讨活动都能积极参加,但是因为研发水平相对薄弱,不能结合学校实际以及学生成长需求进行创生性的策划,于是照搬现象比较多,学生素养培育成效不一定明显。学生素养的提升需要核心校的奉献引领,也需要成员校的不断寻绎和重构。因此,就核心校而言,应带动成员学校跟上步伐,不断消解集团化办学过程中校际合作的困境^[7],努力让每一个成员校得到充分发展。就成员校而言,也要积极参与集团化办学的学校改进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在集团化办学中,不断提高学校研发水平,结合本校学生的成长需要和成长问题,发挥学生素养培育的主体能动性,不断优化和创新学生素养培育的路径和策略,寻找学生素养培育落地的力量。

4.2.3 强化政府主体责任,优化健全政策保障机制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政府主导下的办学模

式改革,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有目标导向的重组配置^[8]。前文结果表明,政策保障是对整体办学成效具有较大影响但均值得分较低的环节。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不管是教师还是学校行政人员均认为,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教师编制增加的支持力度不够,其次是专项经费提供不足。未来亟须对以上两个方面进行针对性改进。首先,就教师编制而言。政府应协调编制、人事和教育等部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相关人事制度的改革,在人事编制、绩效考核、人员流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鉴于集团化办学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编制部门可以为教育集团设置“拓展性动态教师编制”,这类编制不应列入集团学校整体的师生比计算中,在具体的编制核定上应重点考虑优质学校教师输出量和集团整体发展需求^[9]。后期访谈中有集团校长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其次,就专项经费而言。名校集团化建设要有专项经费^[10],地方政府应该把集团化办学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做好教育集团财政预算编制,减少核心校担负集团整体运行的压力。后期访谈中,受访者也表示:“财政应该建立专项资金,目前还是很少的,集团化办学主要靠总校校长的教育情怀。”但可以看出不管是教师编制的增加还是专项经费的提供都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而这正是导致两者开展受到阻滞的原因。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受访者在访谈中指出:“有些政策的出台,教育行政部门一个部门可能解决不了,它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如果省级层面能够出一些集团化办学的政策,作为市一级可能会更好一点。”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省级甚至市级层面的政策支持,主管政府各部门难以形成有效推动集团化办学的合力,集团化办学往往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独角戏”。对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集团化办学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从顶层设计上为集团化办学“立柱架梁”,形成整体规划,进而带动相关部门加快统一认识,不断优化健全集团化办学政策保障机制,合力突破集团化办学中编制与经费两个卡脖子问题,共同推进集团化办学进程。

4.2.4 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的沟通交流

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作为成熟个体,同时也作为集团化办学的参与者与感受者,对集团化办

学实施状况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与了解。但由于双方在集团化办学中的经历以及承担角色与身份不同,其看法可能会存在差异。前文结果表明,两者在集团化办学各具体环节成效重要性的认识上并不统一,特别是在教师发展环节对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的预测和贡献上,两者的观念截然不同,即学校行政人员认为教师发展环节对于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作用较大,但教师却认为教师发展环节对于集团化办学整体成效作用不大,甚至产生负向影响。其可能原因在于名校集团化办学过程中,诸如教师流动、教师培训、教科研等活动开展的初衷虽然是促进教师发展,但由于忽视教师自身的需求,开展的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而教师作为亲历者,其感受往往更为准确。例如,受教师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在此过程中,教师会产生自己特定的利益或情感诉求。利益或情感诉求表达渠道缺位或不畅都可能造成教师的不满,降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削弱教师对于集团化办学过程中教师发展环节的认同。因此,建立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疏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是组织管理的当务之急。学校行政人员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应加强各项工作的宣传解释,主动与教师沟通,聆听教师声音,特别是教师流动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建立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引导集团成员合理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如建立集团内的教师代表大会,或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建立网络利益表达平台,使决策者能够全面及时地了解集团化办学中各种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各种利益冲突,最终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有效协同,共同致力于集团化办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万朋,程钰琳.区域教育治理视域下集团化办学成效分析——以上海市J区单一法人式集团为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4):113-122.
- [2] 史蒂芬·柯维,罗杰·梅里尔,丽贝卡·梅里尔.要事第一[M].刘宗亚,王丙飞,陈允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 [3] 许丹东,傅道麟,吕林海.博士生学术经历具体满意度与整体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江苏高教,2020(7):49-55.
- [4] 刘晓宁,刘晓.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规范、认定与评价[J].职教论坛,2016(25):26-31.

- [5] 张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模式研究[J].教育研究,2017(6):87-94.
- [6] 朱向军.名校集团化办学: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杭州模式”[J].教育发展研究,2006(9):18-23.
- [7] 张建,程凤春.名校集团化办学中的校际合作困境: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组织边界视角的考量[J].教育研究,2018(6):87-97.
- [8] 陆云泉,刘平青.北京市海淀区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研究,2018(5):154-159.
- [9] 贾建国.强制性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分析[J].教育科学,2016(3):69-73.
- [10] 刘希平.借助制度创新提升区域教育均衡化水平——杭州市“名校集团化”办学实践调查[J].浙江教育科学,2008(3):3-9.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ectiveness of Specific Links of Grouped School-running and Its Overall Effect

SHI Yue^a, WANG Jun^b

(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b. Changzhou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grouped school-running in D city,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har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each link of grouped school-running and the overall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guarantee, students' literac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have greater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overall effect of grouped school-running, while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are smaller, and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has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mean score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the highest while the students' literacy the lowest. In addition, policy guarantee and students' literacy are the variables that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overall school-running effectiveness but a lower mean scor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ouped school-running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Keywords: grouped school-running, school-running effectiveness, regression analysis, Shar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责任校对 游星雅)